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英] 史蒂文·卢克斯

(Steven Lukes) 著

袁聚录 译

田世锭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14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英] 史蒂文·卢克斯

(Steven Lukes) 著

袁聚录 译

田世锭 校

B82

L78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2009-0282号

Steven Lukes

Marxism and Morality

© Steven Lukes 198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英)卢克斯(Lukes, S.)著;
袁聚录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9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段忠桥主编)

ISBN 978-7-04-026722-8

I. 马… II. ①卢…②袁…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伦理学-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4799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m.com.cn
印 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880×1230 1/32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7.25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14.3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6722-00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主要继承者道德观中似是而非的矛盾入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正义与权利、自由与解放、目的与手段等道德问题上的具体观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憧憬,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记录,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间的关系。

译丛总序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 20—30 年代、兴盛于 50—60 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 1983 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 10 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①翻阅一下近 30 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

^①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页。

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

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积极回应并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最后还要强调指出,我们翻译这套丛书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原作者的所有观点和主张,因为它们之中有不少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因此,读者阅读这套丛书时还应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对它们的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为了促进正义，
还有谁，正义的人不能与之为伍？
对于将死之人，
还有什么药会太苦？
为了彻底消灭邪恶，
你还有什么邪恶不能忍受？
如果最后你能改变世界，
还有什么会使你太过善良而不去这么做？
你是谁？
投入污泥也

谨以此书纪念彼得·塞吉维克

拥抱屠夫也罢，只是
要改变世界：因为它需要改变！”^①

“你们将摆脱那洪流，
而我们却已沉没其中。
假如谈到我们的过失，
请想一想
你们摆脱了的
那个黑暗的时代。

由于阶级的战争，
我们比换鞋还勤地浪迹异邦，
我们绝望，
若只有不正义，
而没有反抗。

① 布莱希特，1929—1930, *Die Massnahmen* (《措施》)，载于《措施》及其他教育剧
《The Measures Taken and Other Lehrstücke》，译作 *The Measures Taken* Eyre Methuen, London,
1937, 第25页。

“为了促进正义，
还有谁，正义的人不能与之伍？

对于将死之人，
还有什么药会太苦？

为了彻底消灭邪恶，
你还有什么邪恶不能忍受？

如果最后你能改变世界
还有什么会使你太过善良而不去这么做？

你是谁？
投入污泥也好

拥抱屠夫也罢，只是
要改变世界：因为它需要改变！”^①

“你们将摆脱那洪流，
而我们却已沉没其中。

假如谈到我们的过失，
请想一想

你们摆脱了的
那个黑暗的时代。

由于阶级的战争，
我们比换鞋还勤地浪迹异邦，

我们绝望，
若只有不正义，

而没有反抗。

① 布莱希特，1929—1930, *Die Massnahme* (《措施》)，载于《《措施》及其他教育剧》(*The Measures Taken and Other Lehrstücke*)，译作 *The Measures Taken* Eyre Methuen, London, 1977, 第25页。

我们确实知道：
 疾恶如仇
 也会使脸型歪扭；
 怒鸣不平
 也会喊哑嗓门。啊，我们，
 要开辟友爱之土。
 这不是友谊，绝不可能。

但是，当那个时代终于来临，
 人皆互助，
 你们想到我们时，
 请一定宽容。”^①

“又玉批到丁状”
 “丑状之已道不入的义五，新育五
 ，人主更讲于收
 “苦太会西公什育五
 ，恶派天前派时丁状
 “受忍道不恶派公什育五科
 果世变巧道科司景果成
 “婚公去不而身善长太科对会公什育五
 “事景科
 该由派科人姓
 景只，要由夫景派时
 “！变巧要需丁状因；果世变巧要

“离共雅细默科什科”
 。中其巧巧与味什科而
 ，夫按的什科既对成对
 愚一愚雷
 的丁细默什科
 。升和的雷黑个根

“单站的卷倒干由
 ，特早查身派道五排舞出什科
 ，壁坐什科
 ，又五不音只苦
 。特又音巧而

① 布莱希特，1938，“An die Nachgeborenen”（《致后代人》），载于《贝托尔德·布莱希特诗集（1913—1956）》（*Bertolt Brecht Poems 1913—1956*），译作“To Those Born Later” edition by John Willett，与 Ralph Manheim 编，Erich Fried 合作，Methuen，London，1976，第319—320页。

“我和我们这代人都坚信，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了这个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说谎、偷窃、消灭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消灭所有那些正在妨碍或可能妨碍我们事业的人，消灭每一个阻止我们的人。对这一切犹豫不决或表示怀疑就是屈服于‘知识分子的神经质’和‘愚蠢的自由主义’，而这则是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的特征。

“这就是我的推论方式，甚至在我确实抱有怀疑的时候，在我相信托洛茨基 (Trotsky) 和尼古拉·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正在说明的东西的时候，在我看到‘全盘集体化’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怎样‘使土地私有’和‘没收私有土地’的，他们是怎样在 1932 年冬到 1933 年残忍地掠夺农民的——的时候，也是如此，而其他每个人也都像我一样。我亲自参加了这次掠夺：洗劫乡村，搜查被藏起来的粮食，用一根铁棒探查地上的松动之处，这些松动的地方可能通向被埋藏的粮食。我与别人一起，把老人们的储藏柜倒空，对孩子们的哭喊和妇女们的哀号充耳不闻。因为，我深信：我正在完成乡村伟大的、必要的改造；住在那里的人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因为这种改造而生活得更好；他们的悲伤和痛苦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无知或阶级敌人的诡计造成的；那些派遣我的人——以及我自己——比农民们更清楚他们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播种什么、应当何时耕种。

“在那骇人的 1933 年春天，我看见人们死于饥饿。我看见腹部膨胀的妇女和儿童，他们脸色发青，虽仍在呼吸，但两眼茫然、没有生气。我还看见了尸体——穿着褴褛的羊皮大衣和廉价毡靴的尸体；就在农民的茅屋里，就在老沃洛格达正融化着的雪中，就在哈尔科夫桥下的尸体……我看见了所有这一切，而我并未发疯或者自寻了断。我也没有诅咒那些派遣我的人，他们派遣我在冬天取走农民的粮食，在春天说服那些赤脚走路、骨瘦如柴或因病肿胀的农民走进田地去‘以超额生产的工人的作风来完成布尔什维克的播种计划’。

“我也没有失去信念。一如既往，我信仰，是因为我想信仰。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当人们被服从超越人的权力和价值的欲望所支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信仰，这些权力和价值就是：上帝、君主、国

家、道德理想、自由、民族、种族、阶级、政党……

“任何全心致力于实现这些理想的尝试,都会造成人类的牺牲。在承诺给其后代人以永远的幸福这种最崇高幻想的名义下,这些人给其同代人造成了无情的毁灭。在给死者创造天堂的过程中,他们损害并消灭活着的人。他们成了毫无原则的说谎者和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而又始终把他们自己视为有德行的、可敬的斗士。他们确信:如果他们被迫行恶,那是为了将来的善;而如果他们被迫撒谎,那是为了永恒的真理。

“如果你不成为我的兄弟,
我就打碎你的头骨。

[*Und 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

So schlag ich dir dein Schädel ein.]

他们唱着日耳曼雇佣兵之歌。

“这就是我们怎么想的,怎么行动的——我们,拯救所有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信徒。当我们看到这个前提条件以及以高尚的善的观念的名义施行的这些残酷行为时,当我们自己也参加了这些行动时,我们最害怕的是仓皇失措,陷入怀疑或异端邪说,并丧失我们无可限量的信心。

“我为 19 世纪 30 年代的所见而感到惊恐,并为沮丧所压抑。但是,我会以我被教导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怀疑:‘我们出错了’,‘我们太过分了’,‘我们没有考虑到’,‘阶级斗争的逻辑’,‘客观历史需要’,‘用野蛮的手段去抗击野蛮’……

“善与恶,人道与非人道——这些好像都是空洞的抽象。为什么‘人道’应当是抽象的,而‘历史必然性’和‘阶级意识’应当是具体的?我并没有使自己为这些所困惑。我们把良心、荣誉和慈悲的观念都当作唯心主义的偏见,当作‘知识分子的’或‘资产阶级的’,并且因此是不正当的观念而加以拒绝。”^①

^① 科尔别涅夫 (Kopelev), 1975, *No Jail for Thought* (《莫要禁锢思想》), A. 奥斯丁 (A. Austin) 翻译和编辑, Penguin Books edn., Harmondsworth, 1979, 第 32—34 页。



序言

在本书中,我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应当对道德提出什么看法?以及,它给诸如“什么是正义?”,“人们拥有权利吗?如果有的话,他们拥有什么权利?”,“人类的善存在于什么之中?”,“在对目标的追求中,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手段?”这类道德上的中心问题提供了什么答案?二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不论是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价值和标准,还是用其他可以被认为是适当的价值和标准来衡量,我们能对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规则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记录说些什么呢?三是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和道德问题的观念与其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对权力的运用之间有什么关系?反过来,作为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从这种道德记录的考察中得到什么教训呢?在这本书中,我只能较细致地考察上述第一个问题,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将提出我对第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至少,我期望这本书既会鼓励又

会帮助别人去面对它们,因为它们应该被面对,而不是或者被绕开或者被假定为拥有显而易见的答案。

讲得多少更为直率些,我的目的是提出(我明显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即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构、由其继承者所发展的理论,是否能够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道德灾难。当然,这个记录是两面性的。在反对压迫,尤其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记录中,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崇高的地位;并且,用简单的功利主义语言来说,在发展中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执政者所取得的功绩,一定是与历史上存在的其他执政者所常常允许的死亡、饥饿、失业、贫困和疾病的蹂躏以及他们惯常实行的暴政和镇压形成鲜明对比的。这个记录也一定是既与资本主义在其中心地带的人类代价,又与资本主义在其附属边缘地带的人类代价形成鲜明对比的,并且,是与资本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全部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当今,在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在东南亚,而今则是在中美洲的政策——表面关注道德的背后,显而易见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地区暴行的大力支持及其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压制。我们还应该回想起,正如托洛茨基提出、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已经证明的,资产阶级的或自由的民主“绝不是通过民主道路来到人间的”^①。然而,那里的灾难——最重要的是,当如灾难所要求的那样对它们进行考量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承诺。当然,以下情况已被给予并且能被给予许多合理的解释(包括反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贡献):内战期间及之后的布尔什维克恐怖统治;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审判、大流放以及规模庞大的劳动集中营网络等恐怖行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社会

① 摩尔,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根源》),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London; 托洛茨基,1938, “Their Morals and Ours” (《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June 1938, 转载于《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马克思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道德观》, 列夫·托洛茨基, 约翰·杜威和乔治·诺伐克的四篇论文, 第四版 (Their Morals and Ours. Marxist versus Liberal views on Morality) 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69, 第24页。

灾难；波尔布特(Pol Pot)红色高棉的“残忍乌托邦”；以及当代恐怖的、有监视思想的、道德败坏的“现实社会主义”世界，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在那里，市民社会和公共生活已被摧毁，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以及道德的词汇都已完全贬值，沦为辞藻空洞毫无价值的流行语。这些发展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事业值得忠诚甚或值得严肃关注的这种信仰，在这些社会之内或之外已普遍湮灭。

从这种结果中得到满足的那些人可能把本书当作有利的事而表示欢迎；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其他人可能会谴责它或它的出版，认为在社会主义需要所能召集到的所有朋友的时候（这本书写于撒切尔第二任期的次年），它却毫无助益。但是，“没有左翼的敌人”（“*pas d'ennemis à gauche*”）一向是个令人怀疑的原则，它抑制了批评性的讨论；而且，它也无助于社会主义事业避免遭遇其敌人最为强烈的挑战。可以肯定，此书完全不是又一本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相反，它提出了一种既是观念上的，又是历史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之间联系的假设，深信后者只有在一些这样的联系被切断时才会繁荣起来。简而言之，它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解决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以及可能怎样生活这些中心问题的方法有什么问题，深信这种方法与实践中的错误有着某种关联。

然而，这种联系不可用发芽的种子为喻来加以描述：这一比喻错误地并且天真地暗示着，历史发展内在于这种理论当中，而且只有通过这些灾难性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理论被在客观条件和历史偶然性压力之下追逐其利益的历史行动者所攫取，并且，理论的观念被这样的人进行了选择和解释：解释历史结果的是所有这一切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理论的逻辑。至少，马克思主义已经教给了我们这么多。较好的比喻是伤残：尽管它有许多优势，但这种创始人的理论对一定范围的道德问题——大致说来，是关于正义和权利的那些，而正义与权利又限制着人们在眼下及不久的将来所受到的待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且避而不谈。正如第二章和第六章试图证明的，这种伤残从原创理论那里传承给了其主要的继承者。我相信，这种伤残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尽管我在这

里没有对此加以说明,或者勾勒这种伤残对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与无名的)的态度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只有最庸俗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提出要忽略这种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固有缺陷能得到补救吗?如果能,那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或许通过发展由马克思自己提出但尚未展开的思想脉络来补救吗?也许。然而,在这本书中,我所关注的仅是诊断而已: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和道德问题所采取的独特方法的结构,及其潜在的基本原因和可能的结果。



此书的论证渐成目前之状。对这个过程来说，一群布拉格朋友的反应和杰瑞·柯亨(Jerry Cohen)的评论是重要的，朋友们深深地而又确定地怀疑我的题目本身，而杰瑞·柯亨认为它听起来就像一本小册子(它就是一本小册子)。同样重要的是与丹尼斯·朗(Dennis Wrong)和特蕾西·斯特朗(Tracy Strong)的热烈讨论——我同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一起讲授过一门关于这个主题的课程，还有下列人员非常宝贵的反应和建议，他们是安东尼·阿伯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大卫·高德(David Caute)、G. A. 科恩、比尔·康诺利(Bill Connolly)、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蒂姆·贾顿艾许(Tim GartonAsh)、诺尔曼·格拉斯(Norman Geras)、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欧文·豪(Irving Howe)、韦恩·哈德森(Wayne Hudson)、布赖恩·克奈尔-帕斯(Brian Knei-Paz)、雅各布·摩金(Yakov Malkin)、艾伦·蒙特菲尔(Alan Montefiore)、加里·奥斯特罗伦